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唐書輯校
上

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唐書輯校

上

吳玉貴 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書輯校/吳玉貴撰.-北京:中華書局,2008.12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ISBN 978-7-101-06381-3

I.唐… II.吳… III.中國-古代史-唐代-紀傳體
IV.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74609 號

責任編輯:于 濤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唐 書 輯 校

(全二冊)

吳玉貴 撰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1³/₈印張·4 插頁 77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98.00 元

ISBN 978-7-101-06381-3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出版說明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紀事連貫，卷帙浩繁，濃縮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是研究古代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基本資料，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20世紀50至70年代，由全國史學界、出版界通力合作，中華書局承擔組織落實和編輯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以其優秀的學術質量和適宜閱讀的現代形式，逐漸取代了此前的各種舊本，為學術界、文化界和廣大讀者普遍采用，成為使用最為廣泛的權威性通行本。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任務浩大，出版過程漫長。自1959年史記問世，至1978年宋史出版告竣，前後費時20年之久。點校工作舉全國之力，衆多前輩學者為之慨然奉獻，不遺餘力，其功績卓著，超邁前人。但由於當時客觀條件的制約，加以時作時輟，體例未盡統一，疏失亦所不免。隨着半個世紀以來的時代前進和學術發展，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訂工作成為而今的當務之急。2007年，中華書局啓動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面向全國，選賢與能，組織專門班子，制定切實方案，要求進一步完善和統一點校體例，在保持點校本原有優勢的基礎上，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補其罅漏，糾其謬誤，造就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閱讀便利的新的升級版本。

爲配合修訂工程的開展，提供更爲廣泛有效的學術支持，在做好各史修訂工作的同時，還將集中力量做好以下兩個配套項目的編輯出版工作：一是以此前已經編輯出版的“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爲依託，做好歷代“二十四史”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工作，構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研究的基本資料庫；一是編輯出版“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彙編今人校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著述，包括此次修訂過程中形成的各項專題研究成果（如專史研究、校訂札記、點校長編等），爲修訂工作提供一個廣闊的學術園地。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重文獻考據，以實證爲要旨，收錄範圍包括首次發表的新作，如陳美東先生的歷代律曆志校證、吳玉貴先生的唐書輯校等；也有先曾發表，現經訂補的轉精之作，如梁太濟、包偉民先生的宋史食貨志補正，龔延明先生的宋史職官志補正等；還有點校本出版之後學術界校勘補正成果的彙編，如臺灣學者詹宗祐先生編撰的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彙釋。此外，上個世紀點校時遺存的部分未曾發表的校勘長編，如王仲瑩先生的宋書校勘記長編等，其中不見於點校本校勘記的資料在在皆是，對於此次修訂，乃至當今的史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列入本叢刊出版範圍。本叢刊還將集中發表此次修訂過程中產生的相關校勘考證成果，尤其是限於修訂體例未能納入修訂本中的重要內容，以全面反映修訂工作的學術成績。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08年7月

前 言

本書輯錄、整理了太平御覽徵引的唐書的內容。以下試就太平御覽引唐書的性質、史料價值以及整理工作的基本情況略作介紹。

—

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究系何書，是一個迄今為止尚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也是在系統整理太平御覽引唐書時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今人所稱後晉劉昫領銜修撰的“舊唐書”，並不是它最初的名稱。在新唐書撰成之前，一般是將劉昫修撰者稱作“唐書”，比如南宋紹興刻本舊唐書還保留着“唐書”的名稱，未加“舊”字；修成新唐書之後，爲了對這兩部史書加以區別，習慣將劉昫領銜撰修者冠以“舊”字，而對宋代歐陽修領銜撰修者徑稱“唐書”或“新唐書”，兩部唐書也就有了新、舊之分。

新唐書修成之後，舊唐書流傳漸稀，宋人所稱十七史，明人所稱二十一史，清人所稱二十二史，都有新唐書而無舊唐書，舊唐書逐漸被排擠出了“正史”之列。從南宋紹興以後直到明代中

葉，舊唐書一直没有重刻，以至於在坊間“鬱絕不傳，無所考覓”。明嘉靖年間，聞人詮準備重新刊刻舊唐書，一時竟無法尋到完整的版本，經過三年多方努力，纔得以在王延喆處得到紀、志的部分，在張汴處得到了列傳部分，合爲全帙，刊刻印行^①。因舊唐書在明代中葉以前流傳不廣，幾至湮沒不聞，清代流傳的刻本錯訛又很多^②，以至於後人懷疑嘉靖時得到的舊唐書的內容已有散失，并非原貌。比如沈德潛在殿本舊唐書末所附“跋語”中，稱聞人詮所刻舊唐書“志多闕略，表全散軼，且紀、志中多前後訛舛之文，不能復還其舊矣”。如上所說，聞人詮本只是紀、志與列傳部分來源不同，而且舊唐書本來就沒有“表”，所謂“志多闕略，表全散軼”，完全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臆想。但是這種說法雖然荒唐不經，卻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舊唐書的普遍認識。

到了道光年間，岑建功有感于聞人詮本“所據之書，止就殘篇斷簡薈萃而成，初非全部，故魯魚亥豕之文，夏五郭公之句，正復不少”，殿本“蒐羅未備，挂漏良多”，而且聞人詮本已不易得見，殿本列於二十四史之內，“坊肆間罕有單行者”，決心廣泛搜求新唐書成書前的史料，主要是參照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重新整理雕刻舊唐書^③。與沈德潛一樣，岑建功所謂“止就殘篇斷簡薈萃而成”的說法，其基礎也是認爲聞人詮刻本並非完帙。

岑建功在整理過程中發現，太平御覽引唐書中有許多傳世

① 聞人詮刻舊唐書敘，參見點校本舊唐書附清懼盈齋本舊唐書阮序。阮序的說法與聞序略有差歧。

② 參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國書店，1987年）卷六九至九二；趙翼著、王樹民校廿二史劄記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卷一六至二〇；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五七至卷六〇。

③ 點校本舊唐書附清懼盈齋本舊唐書阮序。

舊唐書刻本所沒有的內容，基於舊唐書傳本並非完帙的認識，他斷定這些內容應該就是當時所見舊唐書佚失的內容，于是便以太平御覽為主，將他認為屬於舊唐書散佚的內容輯錄為舊唐書逸文一書。這部書影響很大，多年以來，學術界大都據此將太平御覽所引唐書與傳世舊唐書視為同一部書^①。

太平御覽編纂于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新唐書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纔告修成，新唐書比太平御覽晚了近七十年。如果按常理判斷的話，在修撰太平御覽時還沒有新唐書，則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當然只能是舊唐書。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岑建功本人就承認，太平御覽徵引的唐書與舊唐書有很明顯的區別，比如太平御覽引唐書中的“官品志”，不僅內容與舊唐書“職官志”不同，而且名稱也互異。類似的差異，顯然是無法用“逸文”來解釋的。所以岑建功在舊唐書逸文的“序”中說：“‘官品志’與‘職官志’顯然不同，御覽所引各條疑是韋述所撰唐書，今列于諸志之後，別自為卷以俟考。”在他為舊唐書校勘記寫的“序”中也說：“或謂御覽所引之唐書，不僅劉氏之書，有韋述之唐書在。鄭樵通志藝文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俱載有韋述唐書一百三十卷，御覽所引書目有唐書，有舊唐書，雖係後人所編，非李昉等當時所訂，然御覽中所引，自當有韋述書，不得以為皆劉氏書。”^②一方面稱自己纂輯的內容是舊唐書的“逸文”，另一方面又說，御覽所引唐書，即岑建功自己輯錄的內容中有唐人

① 最明顯的如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的校勘記中，就是徑直將御覽的唐書作為舊唐書的別本引用的。

② 羅士琳、劉文淇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懼盈齋刻本影印，2004年。

韋述編纂的唐書，不全是舊唐書。兩說歧出，前後牴牾。

到了上個世紀 30 年代，岑仲勉先生曾專門研究了所謂舊唐書“逸文”的問題，並針對岑建功的觀點提出了七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舊唐書逸文比舊唐書多出了四十九人的傳，而這些傳在舊唐書中都無可附麗。二是舊唐書逸文收錄了有關太和、萬壽公主的兩段文字，稱可能出自“公主傳”，而舊唐書肯定沒有“公主傳”。三是舊唐書逸文的“四夷傳”中多出了 29 個國家^①，在舊唐書中也根本無可位置。四是舊唐書逸文輯出高宗至文宗時代制舉科目及第人 41 條，但又無處安插，自稱“無可附麗”，等於岑建功本人已經對所謂“逸文”生疑。五、六兩點是舊唐書逸文“地理”、“職官”、“經籍”諸志中佚失的多是一些瑣屑的內容；何以重要的內容均未佚失，而佚失者多系瑣屑，此極不易解。第七點是舊唐書諸帝本紀，宣宗以前比較謹嚴，以後較冗雜，而從舊唐書逸文輯錄的內容來看，宣宗以前的內容較多，而宣宗以後很少，“豈謹嚴者偏多佚，而冗雜者獨幸存乎？”^②

在此基礎上，岑仲勉先生進一步指出，百衲本舊唐書中，尚存六十九卷宋本原書，從張元濟“校勘記”考察，現存宋本舊唐書與聞人銓刻本只有個別字句的差異，“縱使張校未全，要為數有限，何所容如許逸文者？是宋本出而前說不攻自破也。將謂逸於南宋前歟，然北宋人書說曾未之言，所疑更無影響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舊唐書不可能有如此多的逸文。根據岑仲勉先生的論述，再結合上述岑建功本人的自相矛盾的說法，將太平御覽所

① 這是岑仲勉先生的統計結果，據我們的統計，舊唐書沒有立傳者為 26 國。

② 舊唐書逸文辨，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 年。以下引岑仲勉先生的觀點俱出此文，不另注。

引唐書看作是舊唐書確實無法自圓其說。

那麼，太平御覽所引的唐書究竟是一部什麼書呢？

在太平御覽正文前附有“經史圖書綱目”，列舉了太平御覽引用的 1690 種書目，其中出現了兩個書名，一是舊唐書，一是唐書。聶崇岐先生認為，在編纂太平御覽時，新唐書還沒有問世，唐書還沒有所謂新、舊之分，據此推定“經史圖書綱目”是“仁宗以後好事者所撰輯者”^①。也就是說，“經史圖書綱目”的出現應該是在太平御覽成書一百多年之後，即在新唐書流傳以後，纔由後人輯成並附在了太平御覽的正文之前^②。聶先生此說遭到了岑仲勉先生的反對。岑先生指出：“御覽流行之始，當屬官雕，豈容‘好事者’妄加羈附。彼之說，蓋于唐書一名未之細考耳。”岑仲勉先生認為“御覽之唐書，多韋氏舊著，非經劉昫增損後之唐書也”。即太平御覽所引唐書不是舊唐書，但又不全是韋述所撰的唐書，而是“多韋氏舊著”。對“韋氏舊著”以外的內容，岑仲勉先生也作了說明：

御覽圖書綱目云“唐書”者，並韋、柳兩書言之也，“舊唐書”者，指歷朝實錄等言之也，惟卷內引文又統稱曰“唐書”，則直猶通名之唐史矣。

這段話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理解，一是認為“經史圖書綱目”中的“唐書”和“舊唐書”並不是具體的書名，唐書是指唐人韋述的唐

① 太平御覽引得序，哈佛燕京學社，1935 年。

② 上引岑建功說：“御覽所引書目，有唐書，有舊唐書，雖係後人所編，非李昉等當時所訂”，其實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書和柳芳的唐曆；舊唐書是指唐代歷朝的實錄。二是“經史圖書綱目”中具列的唐書和舊唐書，在太平御覽正文中統稱作唐書^①。

與岑建功認為太平御覽的唐書就是舊唐書一樣，岑仲勉先生的觀點也存在許多無法解釋的疑點。

首先，按照岑先生的觀點，太平御覽在引用書目（即“經史圖書綱目”）中將唐代歷朝實錄稱作“舊唐書”，將韋述的唐書和柳芳的唐曆稱作“唐書”，而且這份引用書目，是在撰成太平御覽時與原書一起擬進的，但是為什麼在引用書目中明確分作舊唐書與唐書，但到了正文中卻又統一稱作“唐書”，將“兩類”書混在了一起呢？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其次，在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目錄書中，韋述唐書、柳芳唐曆以及唐代歷朝實錄都是各自成書，而且在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中大量引用了唐曆和唐代歷朝實錄的內容，在南宋王應麟玉海中也大量引用了唐代各

① 這種看法得到了趙守儼先生的認可，趙先生在揚州學派的重要校勘成果舊唐書校勘記（趙守儼文存，中華書局，1998年）中指出，岑仲勉先生的說法“雖因書闕有間，無法證實，但經與御覽引用情況覆按考察，似有一定道理，可備參考。”黃永年先生也在唐史史料學（上海書店出版社修訂版，2002年）中介紹懼盈齋刻本舊唐書所附舊唐書逸文時說：“書後所附逸文十二卷，則多輯自太平御覽裏標名為舊唐書和唐書的文字，雖然這舊唐書、唐書未必真是劉昫進上的舊唐書（岑仲勉認為是舊國史、實錄之類，見所著論文舊唐書逸文辨，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但彙集到一起也方便閱讀。”（見第16頁）在同書中討論太平御覽時，黃先生又說，太平御覽“所引題為舊唐書、唐書的條文也很多，前面講舊唐書岑建功刻本時就說過劉文淇等輯這些條文為逸文十二卷，岑仲勉則認為是舊國史、實錄之類，不論如何都甚珍貴。”（第260頁）黃先生顯然未檢太平御覽原書，並誤解了岑仲勉先生的本意，實際上舊唐書只見於太平御覽正文前的“經史圖書綱目”，在太平御覽正文中引用的只有唐書，沒有舊唐書。

朝的實錄，爲什麼這數十種獨自成書的著作在太平御覽中卻要統一以唐書的面目出現呢？這種情況也是無法解釋的。

第三，中國古代的類書大都是將各種典籍中的資料分類編纂，以便於搜檢，避免翻檢之勞，達到“一書存即衆書存”的效果，太平御覽這一特點尤其顯著。從常理而言，唐代各朝的實錄和唐曆是編年體著作，而作爲國史的唐書是紀傳體著作，太平御覽的編者沒有任何理由將不同種類的數十種史書放在一起，然後以唐書的名義輯入太平御覽之中。實際上，太平御覽卷二八就明確徵引了唐玄宗實錄，這與岑仲勉先生的說法是直接抵觸的。

第四，太平御覽在引用同名著作時，往往在著作前標識作者名加以區分，如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虞預晉書、沈約晉書、謝靈運晉書、朱鳳晉書；范曄後漢書、薛瑩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謝承後漢書；盛弘之荊州記、范汪荊州記、庾仲雍荊州記、劉澄之荊州記；宋膺異物志、曹叔雅異物志、楊孚異物志等等都是顯例。雖然太平御覽因爲資料來源複雜，尤其是有許多內容直接雜鈔自前代類書，在引用書名時難免“錯誤雜亂，至不一致”^①，但從處理同名著作的做法可以看出，太平御覽的編者至少是在努力減少不同的著作因爲名稱相同而混淆的可能性，不能想象太平御覽會在儘量區分開同名著作的同時，將一大堆不同類別的著作在同一個書名下混雜在一起。這從反面證明，岑仲勉先生說太平御覽引唐書“兼舉數種唐代之史”，不僅在道理上窒礙難通，而且與太平御覽處理引用資料的通例也是相違背的。

^① 參見蕭崇岐太平御覽引得序。

最重要的是，從具體內容來看，韋述唐書、柳芳唐曆和唐代歷朝實錄記述的內容，與太平御覽引用的唐書也嚴重不符。

據崇文總目，韋述唐書最初由吳兢撰著，為一百一十卷，時間自唐初至開元。此後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復于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①。

從這段記載可知，題名韋述所撰紀傳體一百三十卷唐書中，有一百一十二卷為唐初至開元間的內容，是由韋述在吳兢舊著的基礎上修改而成；有兩卷為肅宗朝的內容，由於休烈增撰。此後令狐峘曾對以上一百一十四卷的內容加以增補，但並沒有增加卷帙。此外還有作者不詳的十六卷，崇文總目沒有具體說明記載的內容。岑仲勉先生說：“唐書有韋述已後手筆，崇文總目具言之，惜其未詳撰人之十六卷，記事訖何朝，失附注說。以余臆之，或記及中唐已後事，故御覽所徵有德宗朝之馬暢、田悅、王栖耀、韋執誼，憲宗朝之裴垕，穆宗朝之孟簡，與夫會昌、大中等政令也。然合而計之，屬中唐已前者仍佔絕對多數。”

岑先生對崇文總目這段記載的解釋是有問題的。他認為，不知撰人的十六卷中，包括了肅宗以後的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等九朝的內容。這種推測不能成立。當後晉修撰舊唐書時，主要修撰人賈緯曾上奏議論資料準備情況，據冊府元龜卷五五四記載：

^① 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宋代卷第一冊，37頁。中華書局，2006年。本條內容輯自文獻通考，原文見卷一九二，1627頁。

漢賈緯，仕晉爲起居郎，天福六年奏曰：“伏觀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採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①

所謂“已有紀傳”之“紀傳”，就是指韋述等人所撰之唐書。根據賈緯奏議提供的線索可以推知，唐代本朝所編“紀傳”（就是所謂韋述唐書）的時間斷限迄于代宗時。也就是說，崇文總目所稱唐書中“未詳撰人名氏”的十六卷，其實只有代宗一朝的內容，而不是如岑先生所說，包含代宗以下九朝內容。北宋初年太宗朝史官胡旦建議北宋修撰國史的奏議，進一步證實了我們根據冊府元龜得出的推論：

雍熙四年九月，直史館胡旦言：“自建隆元年至雍熙三年，實錄、日曆皆未備。臣按漢明帝後撰光武紀，至靈帝時，成百二十七卷，今東觀記是也。唐太宗述國初起義，紀、表、傳、志，每朝編錄，至代宗成百三十卷，今舊唐書是也。望准漢、唐故事，撰紀、表、傳、志，以備將來國史。”^②

兩相比較可知，一百三十卷唐書記載的內容的確止于代宗朝，所

① 五代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一八，298頁同，惟內容稍簡。

② 玉海（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光緒九年浙江書局本影印，1988年）卷一六八“雍熙修史院”。按，胡旦稱韋述唐書有表，與其他記載不同，姑存疑。

謂韋述唐書，並不包括代宗朝以後的內容^①。與韋述唐書記述的時間範圍大體相當，柳芳唐曆也只是記載了隋末義寧元年至唐代宗大曆十三年的歷史^②，而據上文賈緯奏議，唐代自武宗朝以下實錄闕落。韋述唐書、柳芳唐曆和唐代歷朝實錄記述的內容，最晚只能到宣宗以前。如果按照岑仲勉先生的觀點，則太平御覽引用的唐書中不應該出現宣宗朝以後的內容。

但是從我們輯錄出的太平御覽引唐書中可以見到大量宣宗朝以後迄唐末的記載，舉其大端而言，第 65.1—65.10、1389、1390、1391、1940 等十數條與今本舊唐書宣宗紀內容和範圍，甚至措辭都基本相同；第 66.1—66.13、107、536 等十數條與懿宗紀基本相同；第 67.1—67.14、108 等十數條與僖宗紀基本相同；第 69.1—69.11、110 等十數條與昭宗紀基本相同；第 70.1—70.3 條與哀宗紀基本相同。此外如王徽（第 295、1566 條）^③、張

① 我們從胡旦的話中還可以瞭解到，北宋初年就已經有了“舊唐書”的稱謂，但它既不是指岑建功和聶崇岐先生說的劉昫舊唐書，也不是指岑仲勉先生說的唐代歷朝實錄，而是唐代的國史，即所謂韋述唐書的別稱。又據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遺書”記載，宋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蘇易簡奏稱：“故知制誥趙鼎留心史學，以新唐書紀傳及近朝史書多有漏略，遂尋訪自唐以及近代將相名賢事跡，及家狀、行狀甚多。雖美志不就，而遺稿尚在。望遣直〔史〕館錢熙暫往宋州，詢問鄭〔家〕〔幾〕家人，尋檢奏御。”此所謂“新唐書”，顯然就是指劉昫唐書。也就是說，在北宋初年，“唐書”就有了新、舊之分，不過與歐陽修唐書流傳後不同的是，這時的“舊唐書”是指韋述唐書，“新唐書”或“唐書”是指劉昫唐書。

②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二，199—200 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卷四，111 頁。參見舊唐書卷一四九柳登傳，4030 頁；新唐書卷一三二柳芳傳，4536 頁。或載唐曆紀事止于德宗建中三年，參見郡齋讀書志校證唐曆條“校證”三。按，即便將崔從龜續唐曆計算在內，記述的內容也只限於元和十五年，參見上引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

③ 舊唐書卷一七八有傳。

濬(第253、1007、1859條)^①、鄭從讜(第646、1186第)^②、孔緯(第360、373條)^③、秦宗權(第803條)^④、黃巢(第68.1—68.7、735、802條)^⑤等許多宣宗朝以後迄唐末的人物，不僅都出現在太平御覽引用的唐書中，而且記載的內容也與舊唐書基本或完全相同。可見與岑建功將太平御覽引唐書等同於舊唐書一樣，岑仲勉先生認為太平御覽引唐書“兼舉”韋述唐書、柳芳唐曆和唐朝歷代實錄的結論也是不能成立的。

從岑仲勉先生反駁岑建功提出的七點證據可以看出，岑仲勉先生曾全面考察過舊唐書逸文中輯錄的太平御覽引唐書的內容，並與舊唐書進行了細緻的比較，但是岑仲勉先生立論的依據主要限於舊唐書逸文輯出的內容，而岑建功輯錄舊唐書逸文時有很强的隨意性，只輯錄了他自己認為不見於舊唐書的記載，而對於太平御覽中唐書名下許多他認為與舊唐書相同的材料，則未予理會。岑仲勉先生沒有對太平御覽原文中引用的唐書進行全面考察，所以得出的結論難免會有偏頗。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回到起點，即從原書入手，對太平御覽引用的唐書進行徹底的清理。通過將太平御覽引唐書的全部內容逐條與舊唐書對比研究，我們認為，太平御覽引用的唐書既不是韋述唐書，也不是柳芳唐曆，更不是唐代歷朝實錄，實際上它就是劉昫領銜修撰的舊唐書，只不過太平御覽引唐書保留了舊唐書早期的面目，與我們今天見到的刻本舊唐書有較大

① 舊唐書卷一七九有傳。

② 舊唐書卷一五八有傳。

③ 舊唐書卷一七九有傳。

④ 舊唐書卷二〇〇下有傳。

⑤ 舊唐書卷二〇〇下有傳。

的差異，從而引起了種種不同的推測。

北宋初年，隨着印刷術的普及和發展，宋朝官方開始陸續將前朝十七史修訂刻板，繼宋太宗淳化五年下詔修訂史記和前後漢書後，在宋真宗咸平三年，又下詔修訂三國志、晉書和唐書，兩年之後修訂工作完成，但因為唐書錯訛太多，準備另修，所以沒有刻板^①。今天見到的舊唐書，就是咸平三年做了大量修訂工作後的舊唐書；而太平御覽引用的唐書，則是修訂前的舊唐書，更多保留了劉昫原書的面貌^②。換言之，太平御覽引唐書與今天見到的舊唐書的差異，是因為咸平三年修訂舊唐書造成的。我們今天只能見到被宋人修改後的舊唐書，而太平御覽引唐書則直接引自未經修訂的舊唐書，所以太平御覽引唐書不僅對於校勘和研究舊唐書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對唐代歷史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二

太平御覽引唐書的史料價值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保留了今本舊唐書被大規模刪改前的面貌，對於研究和整理唐代文獻資料，尤其是對整理舊唐書，具有寶貴的校勘價值。二是保

① 參見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卷四九“紹興十七史蒙求”；宋會要輯稿“崇儒”四“勘書”。

② 有關太平御覽引唐書性質的判定，是一項非常繁瑣複雜的工作，需要對太平御覽引唐書的內容逐條與舊唐書進行細緻的比較，並對涉及到的各種情況做細緻的分類歸納研究，而且除了太平御覽外，還需要對北宋前期各種著作對劉昫唐書的引用進行調查和研究，只有這樣，纔能使我們的觀點具體落在實處。我們將在“唐書比較研究”中就此進行詳細討論，限於篇幅，這裏只能大概談一談基本結論和大體的思路，希望能對太平御覽引唐書資料的認識和應用起一點參考作用。